

廖淇康

剖「濠」對「鏡」

從《澳門土生文學作品選》淺談土生文學與其筆下的華人形象

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的歷史已有四百多年，當中有「大地之子」之稱的土生葡人族裔卻甚少為人所關注。如今，社會除了討論過瀕臨滅絕的土生葡語和獨樹一幟的土生菜之外，其他有關土生葡人的文化便無人知曉，甚至還因為全球化的影響，在整個澳門銷聲匿跡了。因此，土生葡人的文化便成為澳門文化的小眾，而土生葡人的文學更是冷門中的冷門(以下簡稱土生文學)。雖然土生文學的作品水準不低，諸如飛歷奇等的小說家更有感人肺腑的佳作，澳門文學終究沒有一群本地讀者去支持，再加上土生文學與漢語文學在語言上的差異，使得這種屬於澳門獨有的文化載體無法展現其應有的光芒，不少好詩和經典均被時代所埋沒，只在澳門少數文學講座上才能發現他們的存在。張堂錡曾在她的土生文學研究報告中寫道：「這些被翻譯結集出版的土生文學作品約 30 部左右，小說數量不多，僅有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1929-2010）的短篇《南灣》（1978）、長篇《愛情與小腳趾》（1986）、《大辮子的誘惑》（1994）；江道蓮（Deolinda Salvado da Conceicao，1914-1957）的短篇《長衫》（1956）。」（1）

另一方面，土生文學中比較廣為人知的經典作品不無透露出作者自身或是整個葡人社群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故其在華文文學界的評價並不高。以小說作家飛歷奇為例，其作品中的中國人大多為窮人，沒文化的代表，在某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對中國人的瞭解並不足夠，甚至帶點殖民時期東方主義的色彩，本文將會在往後章節詳細解釋這一點。不過，相比起描寫中國人，土生葡人作家更喜歡借助文學作品尋找自己的身份，如《作品選》收錄的著名土生葡語詩人阿德(José dos Santos Ferreira)及葡語詩人李安樂(Leonel Alves)等等，其創作主題多以描寫澳門景色，歌頌自己的出生地為主，唯作品甚少被人翻譯成漢語出版，造成土生詩歌的多年沉寂，直至回歸之後才稍有改善。土生文學之所以不受重視，一方面缺乏本地讀者的支持，而作者寫作的語言也是其中原因。葡萄牙語雖為澳門官方語言之一，但懂得葡語的澳門人只佔當中很少一部分，更不用談土生文學能引起澳門讀者的興趣。土生文學正是如此一種特別的存在，使我們更值得花費心思去探索。

著名學者、《作品選》編者之一的汪春寫道：「澳門四百年華洋雜處，中西合璧的歷史，使它成為中國和葡國以及各拉丁語國家文化交流的橋樑。」（2）鑑於篇幅關係，本文將會以兩位土生葡人作家，飛歷奇和江道蓮的生平及其寫作風格分析其作品思想和對中國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印象。兩者在土生文學史上均擁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同時對中國社會或是文化都抱有相當興趣，使得其作品經常出

現華人的影子，華人甚至成為故事的主角。另一方面，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融之地，自然吸引到不少外國人前來認識以及研究，因此土生文學作為反映澳門社會環境的側面，當中有關中國人或事的見解以及看法都值得我們去仔細探討和研究。透過這一側面，我們便能更清楚認識土生文學以至澳門文學的獨特之處。

飛歷奇：描繪異國愛情的文學大師

飛歷奇(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土生葡人，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法律系學生，學成後回澳擔任中學教師和律師，直至2010去世。早在大學時期，飛歷奇已經開始了自己的寫作生涯，還憑藉短篇小說《晝家女阿張》獲得大學寫作比賽的獎項。回澳後，飛歷奇從未中斷其熱愛的文學創作，先後發表《南灣·澳門故事》、《愛情與小腳趾》以及《大辮子的誘惑》等的作品，並取得不少好評。在文化局出版的葡語文學譯叢當中，飛歷奇的小說被編輯稱讚道：「他的敘事總能不斷吸引讀者的眼球，使得他們不間斷般讀下去，直到讀完整本小說。」就本人經驗而言，飛歷奇的《愛情與小腳趾》確實有如此魔力，因為男主人公極富戲劇性的遭遇使得人們對情節發展一直保持著好奇心，總想知道以後會發生甚麼更有趣的事。他對中國的看法也比較鮮明：華人往往是作為低下階層存在的、粗獷野蠻的典型。

飛歷奇被列入《作品選》中的作品都為小說體裁。《晝家女阿張》是這幾篇優秀作品中最為突出的，是土生文學中難得一見的名篇。雖然小說的本質與大部分追求浪漫，要求感性的愛情小說無異，可是這種題材要毫無瑕疵地與家人的生活結合，前提都得保證作者對他們有充分的認識。飛歷奇擅長將中國文化與葡萄牙文化進行比較，並設想他們之間如果發生碰撞，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例如在另一篇作品《鏡海垂釣》中，飛歷奇就說到了爺爺孔德救起中國海盜的故事。《晝家女阿張》講述了晝家女阿張與葡萄牙海員曼努埃爾因偶然機會愛上對方，並且生了孩子，可由於兩者文化和種族的差異，最終兩者在碼頭分開，孩子伴著海員走上了通往葡萄牙的路線，只留下仍然不諳葡語的阿張。小說中作者對澳門景物進行了細膩的描寫，借此襯托雙方在認識彼此時所展現的浪漫氣氛，同時向讀者描繪了澳門這個小漁村靜謐和平的景象。雖然兩者打破了文化上的隔閡，讓愛情得以在他們兩人之間萌芽，而飛歷奇卻認為，這種愛情本來是不穩定的。例如他在小說中寫到：「海員的心中萌發了從這個膚色黝黑、低賤的晝家女身上得到快慰的念頭。畢竟無論如何她是個女人啊。」可見海員的愛情並非是如此的純潔，多少包含了滿足自我需求的目的。而且，作者形容晝家女「低賤」，儘管並非由角色直接說出來，但從整個故事對各人物的描述來看，我們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中國人普遍是低賤的。這種現象在飛歷奇的作品中十分常見，如上述提到的晝家女，《櫻花浴》中被「開苞」的妓女悠雯、《鏡海垂釣》的海盜等等。他們要麼是

「農村娃」，要麼從事各種非法職業，可見作者對中國人的認識有一定限制；反之，葡萄牙人大多被賦予出身顯赫，受過教育等體現其高尚的特徵。無論角色多麼風流，或者多麼霸道，他們總是家財萬貫，愛情不過是調味劑罷了。張堂錡曾在其研究論文寫道：「飛歷奇除了性別的優勢，他還是貴族後裔，對土生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知之甚詳……」(3)足見作者因其社會地位限制了自己創作時思考的廣度。如此一來，故事的發展便無法跳出生硬的人物設定，只在階級之間的奇跡婚姻中徘徊，不僅無法反映澳門社會的整體面貌，更無法帶出深刻的寓意，或許這就是飛歷奇作品的不足之處。

話雖如此，飛歷奇作為土生文學界的故事大師，其著作理應得到文學愛好者的肯定。1996年，《大辮子的誘惑》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在某種程度上肯定了這位文學家的貢獻。在《作品選》收錄的三份作品中，我們不難看見，飛歷奇在寫景方面確有過人處，例如在《櫻花浴》中對澳門大街市鉅細靡遺的描寫，包括列出大街市(議事亭前地附近)各種各樣的建築物，然後介紹大街市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再從街市百姓享樂的據點開啟整篇小說的主題：朋友莫里斯和中國女人悠雯的「櫻花浴」情結。飛歷奇或許不是土生文學史中最偉大的作家，但絕對稱得上「土生文學的說書人」。

江道蓮：專注弱勢的女性作家

江道蓮(Deolinda do Carmo Salvado da Conceição)，典型中葡混血的土生葡人，是土生文學中唯一有突出成就的女性作家。她在澳門出生，從小接受葡萄牙式的教育，後來又到香港學習英語，香港也成為了她的第二個家，二戰前曾奔走兩地教授葡語。二戰後，她回到澳門，擔任《澳門新聞》記者，在此其間開始其旺盛卻短暫的創作生涯。她的唯一一部小說集《長衫》於1956年在里斯本的弗朗哥書店(Livraria Francisco Franco)出版，旋即引起葡萄牙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可惜天妒英才，江道蓮在她的小說集出版後，便於1957年因癌病去世，年僅42歲。作為女性作家的代表，再加上當時的平權運動正如火如荼般進行，江道蓮的小說均以女性為中心，借女性角色的悲慘經歷去突出當時普遍的社會現象。與飛歷奇不同，江道蓮的寫作一針見血，比起歌頌愛情的魔力，她更喜歡描寫戰爭下女性無法改變命運的困境，或是展現當時女性受父權嚴重壓迫的苦況。葡萄牙文學家西蒙·加斯帕·西蒙斯(João Gaspar Simões)曾評價她的作品道：「(主題)新穎而優美，有些地方令人敬佩。」(4)

《長衫》或許是同名小說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因為它與當時的時代緊密結合，同時又道出了戰爭其間普遍家庭的命運。故事以倒敘手法講述了殺人犯阿昌的經歷：「米商」老黃鑫和「酒商」戴生亮是朋友，米商的兒子阿昌和酒商的女兒珍女在家人的安排下便訂了婚。後來珍女出國留學，經過兩年時間的洗

禮，回來時已經不是當年靦腆的女孩，不論談吐舉止都十分大方得體，和阿昌的笨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最後，他們還是結了婚。原本雙方之間在相處方面都沒有問題，可到了戰爭的時候，家裏窮得沒有錢做吃了，讀過書的珍女毅然放下身段，靠穿長衫陪舞養活一家人，但與此同時，阿昌對自己的妻子卻愈發不信任。故事以珍女忘記阿昌要求的承諾，最後被阿昌用刀砍死的故事作結。《長衫》的篇幅短，情節發展快，讀者亦能夠在閱讀過後反思這齣悲劇發生的原因：在戰爭的環境下，所有知識和成就毫無用處，連人的生命也像草芥一般任由現實所玩弄，造成無數家庭的破碎，消滅。珍女是勇敢的女性形象。在小說中她與懦弱無知的丈夫不同，面對殘酷的命運依然掙紮求存，置一切尊嚴於不顧，即便脫離了經濟上的困難，她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家。最後，妻子就因為一次失約而被丈夫所殺，可見當時女性維繫家庭是如此的艱難，而她們又是如此的無私，值得令人讚賞。

另外，《作品選》中的另一篇《施捨》則為讀者講述了有別於《長衫》的女性悲劇。故事的主角是葡萄牙人和中國女人的私生子，可母親過於落後的著裝和低賤的身份使他一直不敢承認，甚至不敢相信是這個寒酸的女人把他生下來的。另一方面，父親也沒有給予他溫暖幸福的家庭：父親不諳漢語，母親也不懂番話，因此他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化和習俗，而且有一次為請西醫和「江湖朗中」的事而爭吵起來。主角實在受夠了這種生活，認為自己的出生是一個罪孽，唯有出國讀書，讓人生重新開始。臨行前，樣子已經變得蒼老的母親為他送行，主角卻感到羞恥，故將一枚硬幣拋到母親的手上，像打發她走一樣。母親在小說的結尾中叫道：「他給我的施捨！他給我的施捨！他用一個錢幣的施捨來回報我給他的生命！」(4)讀者不難發現，主角的反應正是當時人們對女性的普遍看法。女人生孩子，孩子長大了，他的母親沒有取得任何回報，甚至被自己的骨肉所鄙視，討厭自己沒受過教育，或是思想保守。尼采曾說過：「感恩即是靈魂上的健康。」飲水不思源，即使讀遍萬卷書，靈魂仍然是野蠻的，未受教化的。作者創作這篇小說，或許是用來諷刺那些將中國人孝順的美德當作施捨父母的子女。

綜上所述，雖然作家對中國封建制度的認識略顯不足，使得其小說不能突顯出普遍中國女性，以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形象，中國女江道蓮仍無愧獲得「土生文學的女性代表」這一稱號。不僅如此，她在作品在澳門文學研究中也佔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她十分關注中國女性受傳統壓迫的問題，並利用自己文學方面的才華表現出她們生活中的不幸。某些學者如何思靈、何美林和張堂錡等均刊登過文章，仔細分析這位元土生作家的作品思想，並發現其中深邃的寓意：「讀者能夠洞察到那些生活在一個將她們視為與男性不平等，甚至往往比男性地位低的社會中女性的靈魂深處。在這樣的社會裏，女性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空間。」

總結：土生文學雖不完美，但這不是結局

依筆者之見，土生文學固然需要摻雜中國的元素，其獨特性才會表現出來。然而，經過對兩位元作家的作品分析過後，我們不難發現，土生作家對中國文化和社會的認識依然比較片面，其理解大多數停留在中國封建時期的陳規陋習，不見中國文化的多樣性，亦不見中國文化之美，或許這就是土生文學不能引起大眾共鳴的原因。不過，儘管如此，土生文學確實對當時澳門文學的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而且認識不足的問題亦會隨著全球化的趨勢而逐漸消失。正如學者劉登翰於總結所言：「澳門土生文學以其特定的文化內涵和文學價值豐富了澳門文學，是所有澳門文學的閱讀者和研究者所不應忽視的。」(5)文學是一種文化的最大載體，除非製造、改變文化的人都消失了，否則它依然會隨著時間而不斷變化，預示著我們會在未來見到更出色的作品。

土生文學作為澳門文學的一個分支，他的存在值得每一個人審視。

參考文獻：

(1) 張堂錡：《澳門土生葡人作家小說中的華人女性形象》，前沿評論·華語語系文學，第 23 頁

(2) 汪春：《論澳門土生文學及其文化價值》，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第 162 頁

(3) 張堂錡：《澳門土生葡人作家小說中的華人女性形象》，前沿評論·華語語系文學，第 26 頁

(4) A FICÇÃO DE DEOLINDA DA CONCEIÇÃO—O OCIDENTE ENCONTRA O ORIENTE, John Kelly, Revista de Cultura, No. 37 (II Série)

(5) 劉登翰：《迅速崛起的澳門文學》，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文學卷，第 288 頁